

汉中国  
唐国  
研人  
究民  
从大  
书学

# 日常秩序中 汉唐政治与社会

的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Order  
in Medieval Chinese Daily Life

刘后滨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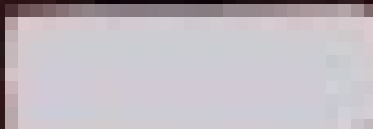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日常秩序中 汉唐政治与社会

The Making of Order in Han and Tang

王仲文、王仲良、王仲华、王仲良、王仲华

王仲文



中华书局出版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汉 唐 研 究 从 书

# 日常秩序中<sup>的</sup> 汉唐政治与社会

---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Order in Medieval Chinese Daily Life

刘后滨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 / 刘后滨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8

(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3581 - 7

I. ①日… II. ①刘… III. ①政治制度史 - 研究 - 中国 - 汉代②政治制度史 - 研究 - 中国 - 唐代 IV. ①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6400 号

· 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研究丛书 ·  
**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

---

主 编 / 刘后滨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责任编辑 / 高世瑜 张晓莉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责任校对 / 卫 晓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张晓莉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1.5

版 次 /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字 数 / 356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581 - 7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总 序

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研究丛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的成果。

汉唐两朝，以其大一统的格局、强盛的国力、开放进取的时代精神、应时而变的制度活力，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从汉到唐，是中国古代大一统政治文化由奠基到鼎盛的发展时期，对中国政治传统的形成影响至深。唐代是中国中古历史的转型期，唐以后的政治文化出现了许多与此前不同的因素，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新的源流。汉和唐作为中国历史上较早时期的盛世，在中国传统史学中一直受到关注。自宋以来，一直到清朝，就多有学者将汉唐看成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政治文化命题。但在1950年代以来的史学研究中，存在断代分割的趋势，即秦汉史和隋唐史被分割成两个断代，而少有人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程放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发展演变的大背景下提出问题。局限在传世史料中按朝代分别进行研究，产生了许多深入的研究成果，但也使汉唐时期历史研究的问题空间在萎缩。近年来，由于新史料的出土和研究视角的转换，汉唐研究领域也呈现出新的学术转机。如汉魏简牍和吐鲁番文书的陆续出土，汉唐间各种石刻史料和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的发现和整理刊布，都为汉唐制度和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增长点。在国外，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对中国历史文化片面的理解，缺乏对中国文化复杂性的认识。国外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加强了解和对话的需求，对以汉唐为中心的中国中古史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有重视历史和传统文化研究的办学理念和优良传统。历史学院自2004年成立汉唐研究中心以来，围绕“中国古代史”国家重点学科的建设，已经形成了一支相对整齐的研究队伍。列入“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研究丛书”的，主要是本中心研究人员的学术专著和论文集，涉及汉唐

间历史发展进程中各个方面的论题，目前已经出版了《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刘后滨）、《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研究》（孟宪实）、《秦汉法律文化研究》（孙家洲主编）、《秦汉统一战略研究》（黄朴民）、《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稿》（李小树）、《汉唐盛世的历史解读》（孙家洲、刘后滨主编）、《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李全德）、《汉魏法律与社会——以简牍、文书为中心的考察》（韩树峰）等著作。随着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本丛书将继续出版下去。

这套丛书的出版，是在中国人民大学211工程、985工程建设项目的推动下启动的。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建设，尤其是以汉唐研究中心为依托的相关课题的研究，得到了多方面的关心指导和帮助。中国人民大学前任校长纪宝成教授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研究的高度重视，给我们的研究以极大的鼓励。汉唐研究中心顾问田余庆、沙知、吴宗国等著名学者也给予了鼓励和支持。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要深表感谢的。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汉唐研究中心

2012年3月

## 卷首语

本书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研究丛书”之一种，是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研究中心同仁的论文合集。书名冠以《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代表了我们的研究取向：一是越来越关注日常秩序中的政治运作与社会变迁。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超越以往官制史的窠臼，从关注官职与职掌转而关注制度的实际运作及运行机制的变迁，关注重大事件与制度规定背后帝国统治的常态运行。在这一点上，政治史或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在靠近。汉唐社会史的研究中则更加关注基层行政及其与基层社会结构的关联，关注社会结构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样态。二是日渐突破朝代的断限，以政治、经济、社会 and 思想文化的形态为中心来构建观察的时段，通过专题的研究来揭示中国历史不同于朝代更迭的长时段变化。这是在以往断代研究基础上的新综合，提出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学术命题。以上两个学术取向的交集，产生了一个相当广泛的切入点或研究视角，即从日常秩序探寻中国古代政治与社会的变迁轨迹。抛开发展规律、社会进化等大概念，无论我们观察的是基层社会还是中枢行政，历史演进总还是有迹可寻的。尽管存世文献和出土文献都存在着偶然性与零碎性，根据史料无法复原出历史演进轨迹中的每一个环节，但是，将点状的信息铺设到日常秩序的常态之中，大致的轨迹还是可以勾勒出来的。历史研究的意义或者魅力，也许正在于此。

据本人的观察，中国史学界对日常秩序的关注，是从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中开始的，是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研究转型带来的一个重要研究取向，并进一步投射到其他的研究领域之中。这种关注并不同于所谓的日常生活史，更多地是把制度的常态运行和日积月累的变迁作为一个主要的观察面向。存在于历史深处的那些日常秩序，是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包括王朝更替、制度兴革、权力纷争乃至人物命运等所以得以展开的基准。所以说，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日常秩序本身，就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命题。

对日常秩序的研究，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视角。从历史理论和史学方法论层面对此进行的总结和探讨尚未真正展开。收录于本集中的论文，都属于实证研究，但是我们并未放弃对理论和方法的思考。具体的观念、事件和制度，背后都隐含着重大的过程和线索。而且，历史叙事和历史解释并不能截然分开。这些文章在史事考订的同时，力图进行一些重要的历史解释，探索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过程。对出土文献的重视以及对传世文献的审慎考订，是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当然，我们还关注存在于档案和文献之外的历史，寻找切近历史真实的多重视角，努力克服由于强化某种范式而造成的对史实判断的错误。

这部论文集的编辑出版，旨在呈现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研究中心在关注日常秩序的研究趋势中进行的努力和取得的初步成绩。收录的 17 篇论文，分为空间与地域、文书与政务、礼仪与风俗、宗教与信仰、经济与生活五个专题。其中大部分论文是已经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原发表刊物附于文末），这次又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修改，也有几篇是未曾发表的新作。文章的作者都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和国学院的在职教师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基本反映了本中心研究团队所关注的学术领域和研究取向。这些文章出自不同年龄段的学者之手，各人的学术背景和学术关注并不相同，把它们选编到一部文集中，是试图寻找我们学术关注中一些共性的东西，并不代表每一位作者都认同书名所标示的研究取向。

感谢提交论文的每一位作者，无论是已发表的论文还是未曾发表的新作，他们都按照论文集要求的体例进行修改或写作。当然，书名及文章的分类如有未当，责任在我个人。在论文集的编辑过程中，研究生顾成瑞在核对史料、通改格式等方面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减轻了我的负担，在此谨致谢意。责任编辑高世瑜、张晓莉以其专业眼光和严谨态度，对全书的文字和内容进行了严格的把关，我代表作者向她们表示敬意和感谢。

刘后滨

2012 年 2 月





# 目 录

## 空间与地域

- 秦汉区域地理学的“大关中”概念 ..... 王子今 / 3  
“太原功臣”的“地域性”——唐代开国史的一个细节考察 ..... 张耐冬 / 14  
终南山与唐代长安社会 ..... 王 静 / 26  
“五岭”考辨 ..... 刘新光 / 69

## 文书与政务

- 秦汉律篇目辨析 ..... 张忠炜 / 85  
任官文书的颁给与唐代地方政务运行机制 ..... 刘后滨 / 96  
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里正的上直 ..... 张 雨 / 116

## 礼仪与风俗

- 中古时期的“姪”与“兄子”、“弟子” ..... 韩树峰 / 137  
匈奴人的发型与发殉考 ..... 马利清 / 171  
虚幻与现实之间：汉唐女性“精变”论考 ..... 曹刚华 / 184  
《清明》诗所述节俗解读——兼论其创作年代及作者 ..... 丁 超 / 210

## 宗教与信仰

- 汉代齐地“尚巫”之风考实 ..... 孙家洲 / 225
- 中国古代的定光佛信仰——兼论唐宋时期的民间  
“造佛运动” ..... 杨 梅 / 234
- 从八面体佛塔看犍陀罗艺术之东传 ..... 陈晓露 / 251

## 经济与生活

- 唐代市制再议 ..... 包伟民 / 271
- 论敦煌的妇女结社 ..... 孟宪实 / 286
- 晚唐翰林医官家族的社会生活与知识传承——兼谈墓志对  
翰林世医的书写 ..... 陈 昊 / 303

# 空间与地域



# 秦汉区域地理学的“大关中”概念

王子今

“关中”，作为区域地理范畴的概念，出现的年代似乎并不遥远。我们看到较早的资料，有《战国策·秦策四》“顷襄王二十年”篇所载楚国使者黄歇对秦昭襄王的说辞。黄歇说道：“臣为王虑，莫若善楚。秦、楚合而为一，临以韩，韩必授首。王襟以山东之险，带以河曲之利，韩必为关中之候。”后面还说到“而魏，亦关内候矣”<sup>①</sup>。对于“韩必为关中之候”一语，姚宏注：“为秦察诸侯动静也”；鲍彪注作：“比之候吏”<sup>②</sup>。这里所谓“关中”，可以理解为“秦”的替代语。或许“关中”一称，最早是秦人用语。

应当说，司马迁的《史记》，是最早频繁使用“关中”这一概念的文献。其中所见“关中”凡92次。

## 一 “关中”不同的地域界定

“关中”的区域地理定义，在西汉史学文献中已经有所不同。有学者指出，“西汉时的关中或泛指战国末秦国的故地，如《史记·货殖列传》：‘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或仅指今陕西关中盆地，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述‘关中，自汧、雍东至河、华’的范围”<sup>③</sup>。而所谓“今陕西关中”地方，则是说后来通行的“关中”一语所代表的方域。关中，“有人说它是在四关之中，有人却说它是在两关之间。所谓四关指的是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sup>④</sup>。所谓两关之间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函

①（西汉）刘向集注《战国策》卷六《秦策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256页。

② 对于“而魏，亦关内候矣”，姚宏注：“魏为秦察诸侯动静也。”

③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第131页。

④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裴骃《集解》引徐广说，中华书局，1959，第315页。

谷关和散关<sup>①</sup>，一种是函谷关和陇关。”<sup>②</sup> 其实对于四关也有不同的说法，如秦地“西有陇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临晋关，西南有散关”<sup>③</sup>。正如史念海先生所说，“本来关中的名称只是表示函谷关以西的地方”<sup>④</sup>，不过，“就关立论的说法虽说是后来才有的，却相当符合当时的情况”<sup>⑤</sup>。

我们看到，《史记》中所见“关中”，涵义确有狭义之“关中”和广义之“关中”的区别。

秦末战争中，刘邦先入关受降，然而因兵势弱小，不能不承认项羽的军事霸权。在项羽分定十八诸侯之后，被迫以汉王身份率部众前往汉中。刘邦当时统辖的地域，包括巴、蜀、汉中，以南郑（今陕西汉中）为都城。项羽又特意分封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为雍王、塞王、翟王，以防备刘邦的势力扩张。这一情形，《史记·项羽本纪》记述：“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故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sup>⑥</sup>《高祖本纪》也写道：

三分关中，立秦三将：章邯为雍王，都废丘；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董翳为翟王，都高奴。<sup>⑦</sup>

然而《秦楚之际月表》则记述：

羽倍约，分关中为四国。<sup>⑧</sup>

又分述“分关中为汉”，“分关中为雍”，“分关中为塞”，“分关中为翟”。

①（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卷五二《陕西》，中华书局，2005，第2452页。

②（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卷五二《陕西》，第2452页。

③（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中华书局，1956，第282页。

④ 史念海：《古代的关中》，《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第26页。

⑤ 史念海：《关中的历史军事地理》，《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第145～146页。

⑥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16页。

⑦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65页。

⑧ 《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第775页。

可见，巴、蜀、汉中，也曾经明确包容于“关中”的地域概念之内。《项羽本纪》记载：“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sup>①</sup> 其实，所谓“巴、蜀亦关中地也”，并不完全是强辩之辞。

《史记》“三分关中”的说法，是取“小关中”之义；而“分关中为四国”的说法，则是取“大关中”之义。

司马迁明确使用“小关中”概念的例证，除了“三分关中”之说以及上文提到的《货殖列传》所谓“关中，自汧、雍东至河、华”之外，还有《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关于萧何事迹的记载：

以客初起，从入汉，为丞相，备守蜀及关中，给军食，佐上定诸侯，为法令，立宗庙，侯，八千户。<sup>②</sup>

“备守蜀及关中”一句，也表明“蜀”是在“关中”以外的。

而《留侯世家》：“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sup>③</sup> 似乎“陇蜀”或“巴蜀之饶”、“胡苑之利”，都在“关中”之外。《货殖列传》又可见“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sup>④</sup> 的说法，则与“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三分关中，立秦三将”也有所不同。因为由“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可知，在所谓“三分关中”的“关中”概念中，是包括“上郡”的。

这样，我们在司马迁笔下，就可以看到多种关于“关中”的地域界定：

(1) “关中”指渭河平原，即后世所谓“秦川”（“关中，自汧、雍东至河、华”，“左殽函，右陇蜀”，“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

(2) “关中”指秦岭以北的秦地，包括今天的陕北地区（“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三分关中，立秦三将”，“分关中为翟”）。

(3) “关中”指包括巴蜀在内的“殽函”以西的西部地区（“分关中

①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16页。

② 《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892页。

③ 《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第2044页。

④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62页。

为四国”，“分关中为汉”，“巴、蜀亦关中地也”）。

最后一种界定，可以称作“大关中”说。

## 二 《史记·货殖列传》的“大关中”观

《史记·货殖列传》中关于基本经济区划分的论说中，可以看到使用“大关中”概念的典型实例。

司马迁综述各地物产，写道：

夫山西饶材、竹、谷、纆、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玢、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sup>①</sup>

由此，将全国划分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四个基本经济区。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这种划分方式是大致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

“山西”，通常理解为崤山或华山以西的地区，与所谓“大关中”涵义相近。《史记·太史公自序》：“萧何填抚山西”，张守节《正义》：“谓华山之西也。”<sup>②</sup>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一又有“河东山西”条，则提出另外的理解：“古之所谓‘山西’，即今关中。《史记·太史公自序》：萧何填抚山西。《方言》：自山东，五国之交。郭璞解曰：六国惟秦在山西。王伯厚《地理通释》曰：秦、汉之间，称山北、山南、山东、山西者，皆指太行，以其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势。《正义》以为华山之西，非也。”按照《史记·货殖列传》中“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的说法，“山东、山西者，皆指太行”之说似亦可成立<sup>③</sup>。然而，司马迁在这段文字之后又说道，“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则显然已将河东归入“山东”地区。山指“太行”之说似未可从。所谓“山西”，应当大致是指

①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53页。

②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3311页。

③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张守节《正义》：盐卤，“谓西方咸地也。坚且咸，即出石盐及池盐。”第3261页。当然，对于所谓“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亦不宜作简单的绝对化的理解，史籍中即可见南阳地区亦食用河东池盐的实例，如《后汉书·贾复传》记述南阳冠军人贾复事迹：“王莽末，为县掾，迎盐河东，会遇盗贼，等比十余人皆放散其盐，复独完以还县，县中称其信。”（《后汉书》卷一七《贾复传》，第664页）



以关中为主体的当时的西部地区。巴蜀地区与关中交通已久<sup>①</sup>，又有秦人曾以关中模式进行开发的历史背景<sup>②</sup>，因而有时亦划归同一经济区<sup>③</sup>。

在进行宏观经济地理分析时，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将巴、蜀和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一般狭义的“关中”合而为一，于是形成包容较广的“关中”概念，并且如此论述这一基本经济区的重要地位：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穡，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楚，僮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馆鞆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sup>④</sup>

文中出现了两个“关中”。所谓“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的“关中”，和所谓“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的“关中”。前者为狭义的“关中”，后者为广义的“关中”。

现在看来，在司马迁著《史记》的时代，广义的“关中”即“大关中”的概念，可能是得到社会一定层面共同认可的<sup>⑤</sup>。

① 参看王子今《秦兼并蜀地的意义与蜀人对秦文化的认同》，《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② 《华阳国志·蜀志》说秦惠王时张仪、张若营建成都城，“与咸阳同制”（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第196页）。四川青川郝家坪出秦武王时“更修《为田律》”木牍，也证实蜀地推行秦田制。

③ 参看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第13~14页。

④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61页。

⑤ 参见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第40~46页。